

利剑须磨 好弓须矫

■曹新旺

明朝初期的季子壮是全国知名的神童，父亲季丘把儿子视为掌上明珠，总觉得自己的儿子天下第一，无人能比。季丘的朋友、著名学者庄元臣多次来到季家，对季丘说：“孩子天资聪颖，这是好事。如果只看到他的优点，宣扬他的长处，而忽视对他的教育和磨炼，就会贻误他的前程。”季丘以为庄元臣嫉妒自己，没有把他的话放在心上。又过了十年，由于季丘对儿子的教育和磨砺缺失，导致季子壮由神童变得与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季丘才知道庄元臣的话有道理，便登门求教。庄元臣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质地精良的剑，如果不加以磨砺，也不会锋利；上好材料做成的弓，如果不用器具时时矫正，也不能百发百中。孩子的成长也是如此啊！”

“利剑须磨，好弓须矫”的故事启示我们：人只有不断地磨砺自己，甚至经受苦难，才能有所成，有大成！正如孟子所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纵观古今中外，那些有大成的人物哪一个不是身受磨难、百炼成钢！

没有勾践卧薪尝胆，哪有后来的三千越甲吞吴；没有古人的锲而不舍，哪有铁杵成针的动人故事；没有持之以恒，哪有“滴水穿石”这一成语；没有路

遥住窑洞的寂寞坚守，哪有不平凡的《平凡的世界》；没有踏踏实实，几十年如一日进行科学研究，哪有屠呦呦的诺贝尔奖；没有钱学森、朱光亚、黄大年、马伟明等中国脊梁的无私奉献，哪有导弹升空、蛟龙入海等国之大器。

还有，受官刑写《史记》的司马迁，被剔除膝盖骨著《兵法》的孙臧，他们经受了多大的磨难，但他们的事迹流传千古！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古人云：“草木不霜雪，则生意不固；人不忧患，则智慧不成。”说的就是这个理！

最近，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一部叫《翻山涉水上学路》的纪录片，主要是展现世界各地住在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是怎样每天克服各种艰险到学校求学的过程。

片中的孩子们4岁到12岁不等，正是花朵一样需要被呵护的年纪，但是他们的上学之路却异常艰难，他们有的要穿越猛兽密布的草原，有的面对万分危险的索桥，有的要克服零下50℃的严寒，有的划着芦苇做的小船独自穿过湖面，有的孩子永远倒在了求学的路上……他们所经历的艰险磨难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这种艰险磨难并没有阻止孩子们渴望上学求知之路。正如网友所说：“孩子们所经受的磨难或许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课，这种磨难将磨砺他们坚强的意志和对待困难的态度，是他们一生受用不尽的财

富！”

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就开始了自己漫长的旅程，在成长的过程中，遇到各种难题在所难免，这难题也是人生必须完成的答卷，完成得如何、得分高低、人生是否精彩，取决于一个人对待人生路上艰难困苦的态度。

看看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哪一个不是历经磨难，九死一生，才创造了自己人生的价值和辉煌！读读《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你会感受到总书记所经历的艰辛和磨砺，懂得他下乡知青成长为党的领袖，从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的总书记，从普通公民到国家主席，从一般军官到军委主席所付出的心血和汗水。一孔窑洞、一盏煤油灯、两箱图书、一片热土，条件困苦；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四大关”，关关难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七年的知青生涯，锻炼出总书记坚毅刚强的意志和顽强拼搏的奋斗精神。正如总书记所言：“七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个时候在那样的困难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要想事业成功，实现理想，砥砺奋进才是正道！

论点短评

小伙计是“没有吃过人的孩子”

谷兴云在《上海鲁迅研究》总第78辑上说，《孔乙己》中的小伙计，是“黑暗王国中的一线光明”。他在咸亨酒店里，不像酒客、掌柜等人那样，欺辱、取笑孔乙己。他关注孔乙己的遭遇，了解孔乙己的家世与“坏脾气”，评价孔乙己“品行却比别都好”。他是《狂人日记》中期盼的“没有吃过人的孩子”。鲁迅寄希望于孩子，寄希望于民族前途。《孔乙己》中的小伙计，是鲁迅希望的体现。

明清实录对“南海”与“南洋”的记载与认知

谢贵安在2018年第六期《南都学坛》上说，作为官方史书的明、清两代《实录》，对“南海”和“南洋”概念作了记载，对南海祭祀作了载录，反映了明、清官方对南中国海及其周围地区的认知水平。《明实录》主要使用的是“南海”概念，几乎未用“南洋”一词；而《清实录》虽然使用了“南海”一词，但更多使用的是“南洋”概念，而范围较前者更为宽广。明清实录对南海或南洋的记载属于遇事则记的动态模式，而未对南海的面积、四至、管辖作静态的描述和知识性的总结；实录作为中央政府在京所修的国史，对南海或南洋这样的边疆地区记载较略，不及当地渔民留下的《更路簿》更为清晰详尽。然而，实录对东沙、西沙等南海诸岛交涉和经营的记载，则反映了国史对国土主权宣示的庄严和神圣。（选自《文摘报》）

往事解密

陶渊明是否真的不为世俗所累

陶渊明自南朝被“人德”化以来，至宋时愈加圣化，被誉为“高简闲靖，晋、宋第一辈人”。后世的有关研究也往往夸大他的“高节”性，称道其胸中“无一点黏着”的超逸。其实，陶渊明也有不能脱俗的一面。

诗作多有叹苦恨穷之意

陶潜生前以“人德”著称。钟嵘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陶渊明逝世百年后，萧统收录其诗文并编纂成《陶渊明集》，并在序中直言：“余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

自唐以降，陶渊明迅速地高大起来，被塑造成一个忘怀世事、绝弃名利的圣人。这也定势了一些人的思维，即便从其诗中读出了世俗的一面也不敢太多议论。但诗圣杜甫在《遣兴五首》中，说出了陶潜“未必能达道”的实话。诗云：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达生岂是足，默识盖不早。有子贤与愚，何其挂怀抱。

《遣兴》诗的中心意思是说，陶渊明尽管一生超凡脱俗而高蹈独善，志在求其心性之真，但在现实生活中终不能完全免俗而忘怀得失。杜甫作此诗，似也不能排除是“自遣”或所谓“聊托之渊明以解嘲”。

在《饮酒二十首》中，陶渊明反思自己“一事无成”的一生：“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

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此诗写自己贫困而孤独的现实处境，写自己为穷困所埋没的苦闷。诗中的孟公，是东汉刘龚。

据记载，东汉张仲蔚隐居不仕，“常据穷素，所处蓬蒿没人，闭门养生，不治荣名，时人莫识，唯刘龚知之”。通篇为“淹留遂无成”的意识所笼罩，而渴望有一个像“孟公”的人来赏识他。看来，陶潜这个“避俗”老头还真未必能够免俗。

对五子成器非常挂虑

陶潜一生四次出仕，且只要有官就做，不管做什么官，不管为哪家做。他从29岁“投来去学仕”，到41岁辞去彭泽县令，宦海沉浮也仅13年。辞官之际所作《归去来兮辞》，是理想受挫、想奋起却苦于无路可走时的不得意之作。通篇渲染出世之乐，文字背后却能让体会到诗人的离世之苦。或者说，诗人是在用想象的欢乐来压抑现实的痛苦，表现出一种极其矛盾的心境，是掩饰不住的内心苦涩。

杜甫举例说其“责子”诗，指出陶渊明对五子之成器与否是非常挂虑的。可见，他虽然想不受世事牵累，却仍然少不了舐犊深情，为五子不能出息而烦恼。

陶潜确实是非常希望儿子们有出息的，期望他们迅速成长、获取功业。陶潜的《责子》诗，据考写于38岁时。诗为四言共十章，前六章历述陶氏先祖功德，以激励儿子继承祖辈光荣的家风；第七章才言及自身，说到自己的不是；后三章旨在表达对儿子的殷切希望和谆谆告诫。

有观点提出，陶潜自号“五柳先生”，此五柳乃指其五子。陶潜自己已不可能成为陶侃那样的人物，故将振兴陶门的希望寄托在五子身上。中国古人庭院之中常植三槐五柳，就是期望子孙中出现三公五侯。五柳之象征说，似可自圆。

入世不能又出世不甘

现实生活中，陶潜算得上是一个失败者。他事业失败，又不擅处世，不擅营生，不会耕种，不会治家，也不擅教子。

杜甫的《遣兴》诗主要是针对陶渊明《责子》诗而发的议论。《责子》诗云：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阿舒已二八，懒惰故无匹。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二句，写的是儿子不喜读书、不求上进。接着分写：阿舒是老大，十六岁了，却懒惰无比；阿宣是老二，快十五岁了，就是不爱学写文章；阿雍、阿端十三岁了却不识数；老五通子，快九岁了，只知贪吃……

可见，陶渊明对这五个“不成器”的儿子是很不满意的，或者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五个儿子。《责子》诗开篇就直言自己老迈，白发布满两鬓，肌肤也不再丰满。因为来日不多，才愈发为儿子没有出息而焦躁不安。他可以不要功名，但还有家庭、子女；他可能脱离了社会，但绝非脱离了文明；他可以沉迷“杯中物”，但还清醒。因为心系五子的前途、挂虑他

们的品学好坏，故而才有此哭笑不得的“责”。

我们不能因此“责”不是板着脸孔的教训，就认为这不是“责”，更不能因为“责”，就贬低了陶潜。杜甫说陶潜不能“达道”，是说他虽然想放下尘俗世事却还是没有放得下。

总的来看，《责子》的“责”并非雷霆之怒，而真正反映了诗人内心的痛苦，反映了教子无方的无奈。于是，陶潜在将儿子一一数落之后说：这也许是天意，还是喝酒去吧。

说到饮酒，世人多将陶潜与阮籍比。阮籍醒时少，陶潜醉时多。陶渊明与阮籍一样，都是极其痛苦的人；陶潜不同于阮籍的是，他以酒寄情入诗，诗中“篇篇有酒”。酒不仅是陶潜遣忧除闷的“忘忧物”，而且是创作的催化剂，是生命的主要内容和乐趣。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陶潜是酒精依赖。在《饮酒二十首》中，他这样唱道：“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其自嘲且自宽，却绝无自责之意。

古往今来，真正的“达道”或“达生”谈何容易！中国文人与政治天生有着不解之缘。如果不卷入政治，一般就只有归向山林田园。穷乡僻壤的封闭，小生产者的狭隘天地，对他们的视野与情感，构成严重的限制和束缚，使他们与外部疏离，难得从时代生活中汲取创作的动力，甚至连诗歌创作在死水一样的生活中也会变得多余。

坦率地讲，古代文人要真正摆脱传统儒家的用世思想，要真正放弃大济苍生的社会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陶渊明进退而皆忧，进不足以谋国、退不足以营生，其悲剧在于入世不能而出世不甘。

（选自《解放日报》）